

近30年来三省制研究综述

◎ 王 韵

【摘 要】 三省制是我国古代封建国家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是我国古代中央官制发展的重要阶段,在我国封建政治制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隋唐的三省制度,学术界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涉及到的问题广泛,研究的范围也随之而扩展,但形成热点争论的问题不是很多,有些问题仍需研究探讨,在引用史料方面还需进一步挖掘材料,在研究方法方面也需要进一步发展,以取得更大的突破。

【关键词】 三省制;官制;综述

【中图分类号】 K2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139(2011)05-0117-6

三省制是我国古代封建国家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是我国古代中央官制发展的重要阶段,在我国封建政治制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隋唐的三省制度,学术界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涉及到的问题十分广泛,现将最近30年隋唐三省制度研究的情况作一综述。

一、三省制的渊源及形成过程

关于这一问题,论者观点基本一致。认为三省六部制是由秦汉的宰相制度发展而来的,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变化,隋建立三省六部制,唐承隋制加以发展和完备。三省制的形成和皇权与相权的矛盾紧密联系,是封建皇权逐渐加强的结果。孙钺《从丞相到三省制的变迁》^[1]、杨友庭《三省六部制的形成及其在唐代的变化》^[2]、张国刚《唐代官制》^[3]都略述了三省中书、尚书、门

下的机构沿革,指出是在两汉魏晋南北朝官制演变和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了三省制。而孙国栋《唐代三省制之发展研究》^[4]认为并非有了三省机构就是三省制,只有经过唐代对三省职权和其相互关系进行新的安排之后,三省制才确立。

与前述观点类似,但进一步分析三省制的形成过程和原因,韩国磐《略论汉至唐三省六部制的形成》^[5]、王素《三省制略论》^[6]都认为尚书、中书和门下是由低级的秘书、侍从机关发展为施政机构的。同时韩国磐先生指出“在这一过程中,也积累了选用官吏的经验”。

从以上研究状况分析可看出,关于三省制的渊源和形成过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980年代,在最近20年已经不是三省制研究的热点,研究没有取得大的突破和进展,是三省制研究中薄弱的一环。

【作者简介】 王韵,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四川 成都 610071。

二、三省制的性质、内容、运作和特点

(一) 关于三省制的性质、内容和运作, 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从传统观点出发进行研究, 即认为三省是执掌封建中央枢机的政权机关, 三省分工合作、相互制约, 为三个独立的机构, 以三省长官为宰相, 三省有各自的职责和任命。赞同这一观点的有孙铤《从丞相到三省制的变迁》, 认为“唐承隋制, 以三省长官为宰相, 共议国政”。持类似的观点还有杨友庭《三省六部制的形成及其在唐代的变化》, 刘曼春《论唐代三省制》^[7], 杨志玖、张国刚《发展变化中的唐五代官制(一)》^[8], 韩国磐《有迹可循的唐朝职官制度》^[9]和吴宗国《三省的发展和三省制的确立》^[10]。姚澄宇《唐三省制度述论——兼论唐太宗的政治革新》^[11]认为三省机构形成了严密的、强有力的国家机器, 并分析了三省的会议制度政事堂制度、中书舍人五花判事制和尚书八座会议制的内容。

在传统观点的基础上, 王素《三省制略论》提出三省制是由三省首长制、三省并重制和三省分权制三个内涵因素构成的一种施政机构宰相制。高新才等《论唐代三省制的形成与消解》^[12]也认为三省首长制、三省并重制、三省制的同时建立, 意味着三省制所需要的人的因素、组织因素和权力因素得到满足, 且三个因素相互牵制、相互协调, 避免某一部门的专断, 这标志着三省制这一联合有机体的完全建立。

2、从隋唐中枢机构体制、唐代宰相制度的角度研究三省制的内容和职能。如郑宝琦《略论隋唐中枢机构的职能》^[13]和慕白《唐朝宰相制度流变略谈》^[14]都认为唐初三省中枢机构趋于完善, 三省职责严明, 共同辅助皇帝处理全国要政, 进行集权统治。

付刚、贺春健《刍议唐朝中央政府的分权制衡》^[15]认为唐代实行集体宰相辅政制度, 中书省掌决策权, 门下省掌审议权, 尚书省掌执行权。

“唐朝三省构成的权力中枢之间的运作是制度化

法律化的。三省分割相权、相互制衡与纠错, 这是一种科学合理的权力结构”。

3、从行政学角度对三省制在隋唐两代行政实践中的职能和运作进行研究和分析。如李孔怀《汉唐宰辅权力体制述论》^[16]认为以中书主出令、门下主封驳、尚书主奉行的三省分权制组织严密、职权分明, 是“中国封建社会行政体制发展成熟的标志”, 指出在三省分权运行的过程中, 皇帝仍是在决策发生异议时的最后审定者, 三省分权、制约体制是唐初行政中枢的基本结构, 对唐初的政治稳定起过积极作用。王颖楼《隋唐官制》^[17]认为隋唐建立以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及御史台为核心的行政体制, 以中书省制令、门下省封驳, 尚书省承而行之, 御史台纠劾非违, 这是共同协作又相互检察的行政机制。这种机制的运行既能防止滥用权力, 又能保证政令的正常贯彻。

4、从与传统的“三权分立”、“三省并重”不同的观点进行研究。黄利平《隋唐之际三省制的特点及尚书令的缺职》^[18]指出隋唐之际的三省制以尚书省为首, 尚书左右仆射实居首席宰相的地位, 并认为隋唐之际的三省制是以尚书、中书、门下并重的传统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从另一角度对“三权分立”提出不同意见, 袁刚《隋唐三省体制析论》^[19]认为三省分权有两个层次, “第一层是中书、门下两省共同行使的辅助决策事权与尚书省行使的行政管理事权的分立, 第二层是在此基础上决策权又一分为二, 中书主草诏制令, 门下主审封驳, 成为辅助决策的两道程序”。同时指出三省内重外轻之势非常明显, 从衙署建制上三省也体现出决策与行政轻重区分的特点。并在其专著《隋唐中枢体制的发展演变》^[20]中重申了这一观点。这一见解强调决策与行政分职的内在实质, 是三省制性质和运作方面研究的突破。

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下的三省机构与职权——兼论中古国家权力动作方式的转变》^[21], 提出了新的“中书门下体制”概念, 用来涵盖中晚唐政治体制运作的整体特征, 认为相对于三省制

来说,中书门下体制的基本特征是宰相有了裁决政务的常设机构,“中书门下成为超然于三省之上的最高决策兼行政机关,使职和使职化的六部寺监成为政务执行的主体,唐代政务裁决的中心转移到了中书门下,国家最高权力的行使不再通过三省分工制衡的机制,而是以中书门下为核心形成了新的运作机制”。

5、从政治学角度进行研究。林怡《论唐初君主专制政体中的三省分权》^[22]以“贞观之治”为切入点,认为为了实现儒学所倡导的仁政王道的政治理想,李世民在政权建设上强化并完善了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分权的政治运作机制。指出“三省分立的中央管理机制,使得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相对地得到了分割:决策、审议、执行的权力分属相对独立的三个省,既抑制了大臣权力过重的现象,又防止了皇帝的主观臆断刚愎自用”。

(二)关于三省制的特点,论者研究并不多,也没有形成争论或者是达到一致的观点。主要有黄利平《隋唐之际三省制的特点及尚书令的缺职》,认为隋唐之际的三省制体现出了以尚书省为首的结构特点。袁刚《隋唐三省制析论》指出隋唐三省制的最大特点是“辅政机构改革的设置以及决策与行政的分职”。

从以上研究状况分析可看出,三省制的内容、运作和特点的研究是近30年来三省制研究的重点,论者有从新的角度出发得出新的结论,但并不多,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三、三省制在唐代的变化、变化原因及其对唐代社会的影响

1990年代至今以来,论者不再局限于对三省制本身内容、特点的研究,而是将这一制度置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对三省制在唐代的变化、变化原因及其对唐代社会的影响进行研究分析,成为三省制研究的热点。

(一)关于三省制在唐代的变化情况,有以下几种观点:

1、三省制在中唐时期开始受到削弱,三省系

统逐渐遭到破坏。这是大多数论者所持的观点。认为三省制的削弱表现在下级官员参预政事,三省长官相权旁落,三省六部职能废弛,宰辅集团成份发生大的变化,三省分权结构更趋多元化。如吴枫、关大虹《略论晚唐时期三省职权的转移及原因》^[23]认为,晚唐时期,组织严密、机构整齐的三省制度发生根本变化,相互制约的三省职权不复存在,职权转移他所。郑宝琦《略论隋唐中枢机构的职能》指出,唐后期三省制逐渐破坏表现在相权一再被侵害及宰相地位的下降。类似看法的还有孙钺《从丞相到三省制度的变迁》,吴枫、关大虹《中唐时期三省制度的削弱与变化》,郑强胜《中唐宰相制度的变化及其影响》^[24],王素《三省制略论》。

2、三省制受破坏后,出现新中枢取代旧的三省中枢,这个观点是对三省削弱后的情况进一步分析得出的结论。持这一观点的有袁刚《中唐之际中枢体制的解体》^[25]一文,该文指出“中唐时三省中枢体制的内部决策机制遭破坏,三省施政系统在德宗时全面崩溃,唐宪宗时,以翰林、枢密、中书门下(政事堂)三头组成的新中枢体制取代了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的中枢地位”。戴显群《唐后期政治中枢的演变与唐王朝的灭亡》^[26]认为唐后期中枢大权从外朝逐渐移入内廷,“从而形成由宰相、枢密使、翰林学士共同构成的新的政治中枢,取代了唐初三省长官共掌相职的格局”。

刘后滨对袁刚“新三头体制”中的翰林学士院和枢密院的地位提出了质疑,认为二者并没有取得宰相的地位,只构成皇权运作中的环节,并在其专著《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公文形态·政务运行与制度变迁》^[27]中考察了三省制转变为中书门下体制的过程,认为开元十一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后,“唐代中后期的政治制度,在中枢体制上已不再是三省制,而应称为中书门下体制;在中央行政运作中也不再是尚书六部体制,而是与北宋制度更接近的使职差遣体制。在行政运作机制上,唐后期的变化趋势已经奠定了北宋初年行政体制的格局”。这是有关三省制和唐代

政治制度研究的新突破。

类似的观点还有王军强《试论唐朝尚书令之缺职》^[28]，认为中书门下政事堂的设立是一个重大的变化，此后三省之名虽继续存在，政务处理也还是唐初形式，但实际上已不按程序分工，政事堂不仅是议政机构，而且是国家决策最高权力机关。

而李全德《晚唐五代时期中枢体制变化的特点及其渊源》^[29]认为，以政务处理程序分工为特征的三省制自唐玄宗中期以后便已名存实亡，唐代中后期的中书门下体制历经晚唐、五代的演变，至宋代前期形成了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分掌民政、军政的二府体制。

3、三省制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三省内部职权变化和权力调整的观点。罗永生《唐前期三省地位的变化》^[30]认为政事堂迁到中书省后，中书令已居主导地位，出现了中书、门下两省长官兼主行政事务以至政事堂兼管行政事务的新形势。尚书省实际上已处于中书、门下两省决策机构下僚的状态。俞纲《唐后期中书、门下侍郎平章事职权的变化及特点》^[31]指出，唐后期三省仍是最高权力机构，但其内部职权发生很大变化，“由中书令、侍中、仆射三省长官共政构成的三省间联系的格局，逐渐转变为主要由中书、门下两省侍郎平章事秉柄构成的新格局”。

贾玉英《唐宋时期三省制度变迁论略》^[32]从三省长官和机构在中央政治体制中的地位变化来探讨了唐前期三省制度的变迁，认为唐前期三省长官在中央政治体制中地位变迁的趋势是逐渐下降，并且这些变化是三省制度由完备到破坏的一个重要缩影。

宁志新、董坤玉《唐朝三省的权力格局及其地位变化》^[33]指出，由于三省长官的品秩不同以及议政地点的变化和皇帝的干预等诸多因素，遂使三省的地位并不完全平等，并从班序和权力上分析了中书、门下两省的地位在不同时期的升降变化。

(二)关于三省制在唐代发生变化的原因，论者从多种角度进行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种意见：

1、从三省本身的职权变化和削弱分析三省制变化的原因。即认为节度使“出将入相”打破了三省分权的政治平衡，设置专使直接削弱了尚书六部的行政职能，翰林学士草拟诏诰文书代行了中书省部分决策之权，宦官专擅朝政瓦解了三省制度的组织原则。持这一观点的有吴枫、关大虹《中唐时期三省制度的削弱与变化》，李孔怀《汉唐宰辅权力体制述论》，王素《三省制略论》。

2、从唐中后期的社会历史背景、外在因素影响分析三省制的变化原因。杨友庭《三省六部制的形成及其在唐代的变化》认为三省制的变化是由政治形势决定的，是为适应统治集团内部斗争需要而引起的。与此意见不同，郑宝琦《略论隋唐中枢机构的职能》认为“根本原因是由于作为经济基础的均田制遭到瓦解和破坏”。

另有论者认为三省制的变化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唐中后期藩镇对抗中央，阶级矛盾激化，门阀政治崩溃，社会经济发展引起上层建筑的变化，并且三省制的崩溃和整个唐代社会政治状况的发展变化相一致。如俞纲《唐后期中书、门下侍郎平章事职权的变化及特点》指出，“安史乱后，受特定政治、经济、军事形势的制约，三省制度名存而内容发生重大变异”。持类似意见的还有吴枫、关大虹《略论晚唐时期三省职权的转移及原因》。

3、认为三省制发生变故有其内在潜因。袁刚在其论文《隋唐三省体制析论》中通过对中书、门下两省内部组织的剖析，指出唐统治者为了平衡两省将职事性质相同的官硬分为左右，分隶两省，将职事不同的几类官文属于某省，形式整齐，“但却违背了组织机构与职能目标一致的原则”，“由于设官目标的不一致，两省内部结构很不稳定，其在高宗武后当政时迅速发生变化也就不可避免”。这种观点为研究三省制的变化原因提供了新的视角。

高新才等《论唐代三省制的形成与消解》认为，三省制发生变革的原因在于三省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皇权和相权的矛盾，从三省制实施始就采取的一系列变革措施导致三省制的破坏。

(三)关于三省制对唐代社会的影响。论者观点一致,没有形成大的争论。认为在唐初三省制对加强皇权,维持政治稳定起过积极作用,唐中后期三省制受到削弱和破坏后,中央集权统治被削弱,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加剧,加速了大唐王朝灭亡的历史进程。

从以上研究状况分析可看出,对于三省制的变化情况及原因的研究成果较多,有不同的角度和结论,而关于三省制对唐代的影响论者观点趋于一致。

四、与三省制有关的一些重要问题

(一)唐初宰相制度是否为三省制的问题,分歧较大。

传统观点认为唐初三省长官皆宰相。1990年代有论者提出新观点,认为唐初宰相制度非三省制,而是以中书、门下二省为核心的二省制。首先提出这一观点的是刘兆君《隋唐“三省宰相制度”辨》^[34]认为,唐初尚书仆射还没完全取代尚书令,“仆射虽带他名为相,行相权,但仍不能视为制度之宰相,所行使的相权,绝不是具有独立意义的,代表尚书省执行性质的相权,而是同中书令、侍中具有同等意义的参议决策权力”。赞同此观点的有李湜《论唐代宰相中书门下二省制》^[35]一文,该文认为,唐初通过虚废尚书令及给左、右仆射加带宰相职衔的方法剥夺了尚书省原有的宰相三省制格局,尚书省成为中书、门下二省之下单纯执行政令的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施行制敕。

针对这一问题,韩国磐《唐初三省长官皆宰相——〈论唐代宰相中书门下二省制〉读后》^[36]对唐代宰相中书门下二省制的观点进行反驳,认为尚书省长官从唐初起就不是宰相的说法不准确,指出“武德元年后到唐太宗去世,尚书仆射不加衔即为宰相,高宗即位后到武则天去世,仆射须加同三品等衔方为宰相,及至神龙、景云时,仆射有不加衔者即不能履行宰相之职”。

(二)关于唐初尚书令阙置问题的探讨。

传统观点认为是因唐太宗曾任此职,臣下

“避不敢居”。论者进一步研究提出新观点,认为是加强皇权、限制相权的需要。如黄利平《隋唐之际三省制的特点及尚书令的缺职》认为“尚书令缺职不是由于某个皇帝的个人因素,而是尚书令本身已不见容于当时的中央集权体制”。刘磐修《唐贞观阙置尚书令辨析》^[37]也认为是为了防止尚书令个人专权和贯彻三权鼎立原则。

(三)关于中书舍人“五花判事”的研究。

陈荣海《唐代的“三省制度”和“五花判事”》^[38]认为“五花判事”指唐初中书舍人有权领衔具名向皇帝提出自己的意见,并允许各执己见。这有利于决策者咨询意见,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更深入的研究有袁刚《唐朝的五花判事和六押制度》^[39],该文认为“五花判事”和“六押制度”是唐代中书舍人代表皇帝、协助宰相批答百司奏抄表章的制度,“是唐代前期三省辅助决策机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四)关于门下省的研究。

罗永生《三省制新探——以隋和唐前期门下省职掌与地位为中心》^[40],一文用统计学和计量法系统研究了隋及唐前期门下省发展的经过,分析门下省成为三省核心的原因,及其后门下省在三省体制内地位的升降变化。

综上所述,近30年三省制研究取得了重大成果,涉及到三省制本身及隋唐中枢机构、有关的重要制度等诸多方面。研究重点有所变化,从三省制的渊源、内容、职能研究至1990年代兴起的三省制的变化及其原因、三省制相关的重要制度的研究,研究的范围也随之而扩展。但形成热点争论的问题不是很多,有些问题仍需研究探讨,如有关三省决策辅助工作、三省附属的宏文馆和崇文馆,三省内部运行机制,中书、门下长官和下属关系等问题。在引用材料方面没有突破传统史料的范围,还需进一步挖掘材料。在研究方法方面也运用了行政学、决策学等新的方法,但利用其他社会科学的方法较少,一些自然科学的方法如系统论、控制论等也涉及很少,需要进一步发展,以取得更大的突破。

【参考文献】

- [1] 孙钺.从丞相到三省制的变迁[J].史学月刊,1982,(2).
- [2] 杨友庭.三省六部制的形成及其在唐代的变化[J].厦门大学学报,1983,(3).
- [3] 张国刚.唐代官制[M].三秦出版社,1987.4.
- [4] 孙国栋.唐代三省制之发展研究[A].唐宋史论丛[C].龙门书店,1980.
- [5] 韩国磐.略论汉至唐三省六部制的形成[J].厦门大学学报,1988,(3).
- [6] 王素.三省制略论[M].齐鲁书社,1986.1.
- [7] 刘曼春.论唐代三省制[J].史学月刊,1984,(1).
- [8] 杨志玖,张国刚.发展变化中的唐五代官制(一)[J].文史知识,1985,(7).
- [9] 韩国磐.有迹可循的唐朝职官制度[J].江西社会科学,1988,(6).
- [10] 吴宗国.三省的发展和三省制的确立[A].唐研究第3卷[C].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 [11] 姚澄宇.唐三省制度述论——兼论唐太宗的政治革新[J].南京师院学报,1982,(3).
- [12] 高新才,郭爱君,王秋萍.论唐代三省制的形成与消解[J].政治学研究,2004,(2).
- [13] 郑宝琦.略论隋唐中枢机构的职能[J].北方论丛,1988,(6).
- [14] 慕白.唐朝宰相制度流变略谈[J].文史杂志,1993,(3).
- [15] 付刚,贺春健.刍议唐朝中央政府的分权制衡[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J].2008,(12).
- [16] 李孔怀.汉唐宰辅权力体制述论[J].中国史研究,1993(4).
- [17] 王颖楼.隋唐官制[M].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
- [18] 黄利平.隋唐之际三省制的特点及尚书令的缺职[A].唐史论丛(2)[C].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 [19] 袁刚.隋唐三省体制析论[J].北京大学学报,1994,(1).
- [20] 袁刚.隋唐中枢体制的发展演变[M].天津出版社,1994.
- [21] 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下的三省机构与职权——兼论中古国家权力动作方式的转变[J].历史研究,2001,(2).
- [22] 林怡.论唐初君主专制政体中的三省分权[J].华侨大学学报,2001,(1).
- [23] 吴枫,关大虹.略论晚唐时期三省职权的转移及原因[J].吉林师院学报,1987,(2).
- [24] 郑强胜.中唐宰相制度的变化及其影响[J].河北学刊,1990,(6).
- [25] 袁刚.中唐之际中枢体制的解体[J].争鸣,1990,(2).
- [26] 戴显群.唐后期政治中枢的演变与唐王朝的灭亡[J].福建师大学报,1999,(3).
- [27] 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公文形态·政务运作与制度变迁[M].齐鲁书社,2004.
- [28] 王军强.试论唐朝尚书令之缺职[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5,(1).
- [29] 李全德.晚唐五代时期中枢体制变化的特点及其渊源[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6).
- [30] 罗永生.唐前期三省地位的变化[J].历史研究,1992,(2).
- [31] 俞纲.唐后期中书、门下侍郎平章事职权的变化及特点[A].文史39[C].中华书局出版社,1994.
- [32] 贾玉英.唐宋时期三省制度变迁论略[J].中州学刊,2008,(11).
- [33] 宁志新,董坤玉.唐朝三省的权力格局及其地位变化[J].河北学刊,2008,(9).
- [34] 刘兆君.隋唐“三省宰相制度”辨[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1,(1).
- [35] 李湜.论唐代宰相中书门下二省制[J].中国史研究,1996,(1).
- [36] 韩国磐.唐初三省长官皆宰相——《论唐代宰相中书门下二省制》读后[J].厦门大学学报,1997,(4).
- [37] 刘磐修.唐贞观阙置尚书令辨析[J].菏泽师专学报,1991,(1).
- [38] 陈荣海.唐代的“三省制度”和“五花判事”[J].北京档案,1987,(5).
- [39] 袁刚.唐朝的五花判事和六押制度[J].安徽史学,1996,(4).
- [40] 罗永生.三省制新探——以隋和唐前期门下省职掌与地位为中心[M].中华书局,2005.

(责任编辑 邹一清 杨丽华)